

思之思

20世纪
中国文艺思潮论



昌切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思 之 思

——20 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

昌 切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09)号

思之思

——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

◎昌切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2.5印张 299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307-01620-6/I·135

定价:11.50元

【内 容 简 介】

全书由“概论编”、“现代编”、“当代编”和“附录”组成。“概论编”较全面深入地探讨 20 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取向；“五四”文艺思潮向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的递嬗；从“五四”到“新时期”文艺思想演化的轨迹，并附有作者对文艺性质的专论。“现代编”是全书主体部分，中心论题是瞿秋白、冯雪峰、周扬、胡风、茅盾等人的文艺思想。此编专注于瞿秋白等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理论的核心概念和理路，力求整体把握他们的文艺思想，他们文艺思想的区别和联系，并辅以若干创作的实证。此外还勾勒了现代“自由作家”自产生到消亡的历史轨迹。“当代编”着重研究 1985 年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由绝对走向相对的转型，和文化的青春化、多极化趋势，对文艺的商品化、王朔式作家角色的转换、文艺文本的相对性、先锋小说的异质、通俗文学的重新命名等问题，分别作了别具一格的生动评析。

序

陆耀东

在商海大潮波及学术园地时，本书作者仍在攀登学术山峰的艰难困苦道路上跋涉。这使我很受感动。我不轻视“下海”的学人。“下海”也需要本领，需要勇气……。人各有志，又各有所长；各项事业都有待才华过人的人去开创、发展；何况，学术岗位只能容下很少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学术之峰前，没有“安贫乐道”思想准备的人，没有“为伊消得人憔悴”一样钟情的人，恐难以臻于高境界。

我和张洁同志的最初相识，是在一次鲁迅学术讨论会上。他的发言，现在我已记不确切，但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他蕴有理论思维的潜力。正如同优秀的作家长于形象思维，富有神奇的想象力，从事文学研究者也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如知识广博，艺术感敏锐，理论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较强等。这一切不能说与人的天资无关，但主要有赖于后天的勤奋学习、训练、实践。一生对复杂现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会高屋建瓴地梳理、综合分析者是少数，天才更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天资中等水平，这就靠特别勤奋。据我的了解，张洁同志很努力，认真读了许多书，撰写了不少论著，收在本书中的30余万言，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涉及的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仅论严肃文学，也议通俗文学。各篇大都有著者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前人和同

时代人多所论及的问题，张洁同志也选择一个便于理顺头绪的新的切入口，他在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周扬、胡风先生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艺思想时，主要是从他们关于“文艺是生活本质的形象化反映”这一命题入手进行剖析。他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文学本体观的推理程序

之一是：文艺是生活本质的形象化反映，而生活实质上乃是矗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生活的本质理当是政治的本质，因此，文艺是政治本质的形象化反映。其推理程序之二是：文艺是政治本质的形象化反映，而形象化实质上是形象思维过程，形象思维过程理当是本质化或典型化过程，因此，文艺是政治本质的典型化反映。其推理程序之三是：文艺是政治本质的典型化反映，而反映者即创作主体实质上乃是处在一定的经济地位、从属于一定阶级的创作主体，创作主体对政治本质的反映理当是带着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能动反映，因此，文艺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创作主体对政治本质的典型化反映。由此，文艺便成为政治本质的形象载体了。

这种梳理虽难免过于简略，然而提纲挈领，思路清晰，便于人们认识这种文学本体观的特长与局限性。胡风、冯雪峰先生与周扬先生的文艺思想的差异，并不在最根本点上，而在对于创作客体、创作主体和文艺的进一步具体阐释上。例如关于创作客体，周扬先生一向强调题材的重大作用，主张写重大的政治生活，1936年倡导“国防文学”时，说国防文学应写有关国防题材。鲁迅先生当时并不轻视题材，但不同意将创作题材的范围限制在狭窄的领域内，他说：“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

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当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①又说：“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②所以他再三地对青年作家说：“可以各就自己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③，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胡风先生是倾向于鲁迅先生的观点的。在1955年，我们批判胡风时，常引用他下列一句话：“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有诗”。^④其实，胡风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鲁迅在谈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写什么时说：“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⑤题材对文学作品有一定意义，但很有限。中国明清四部长篇小说，《水浒传》写农民起义；《红楼梦》写封建官僚家庭内部人物生活，《儒林外史》则以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西游记》取材于神话传说。就题材而论，《水浒传》的最重大，而就各个小说的整体而论，《红楼梦》远远超出其他三部作品。我着重议论周扬先生对题材看法的偏颇，并非肯定胡风先生的论述毫无瑕疵，他的理论弱点在于适当地注意题材的差别不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此文系冯雪峰拟稿，鲁迅同意发表。文字虽与鲁迅的文风不一，但观点符合鲁迅原意，因鲁迅在别的文章和致友人书信中，也讲述过相同或相近的意见。《致罗清桢信》说：“我以为少年学术刻，题材应听其十分自由选择”，《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说：“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

② 鲁迅：《致李木华（1935年2月4日）》。

③ 鲁迅：《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④ 胡风：《为了明天》。

⑤ 鲁迅：《且介亭杂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够（鲁迅后期注意及此）。他和鲁迅观点一致的地方，是看到了非重大题材也可写出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我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白、茅盾、冯雪峰、胡风、周扬之间，与其说是正确与错误的关系，不如说他们的理论可以看成是互补的。张洁同志在剖析、评析诸文豪的文学本体观时，正是如此持论的。

本书论及的问题较多，其中不少是相当重大而又复杂的，难度很大，甚至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但张洁同志作了可贵的探索，在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上留下了前进的足迹。我觉得著者有时较谨慎，更多的是勇于论断。一般说，前者年老者常取之，后者往往是中青年学者的特点；前者最忌陷于人云亦云，四平八稳；后者难免粗疏，失之偏激。我钦佩那些在学术领域内勇于并善于猛进的学者。马克思说：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这是至理名言。在科学上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需要艰苦细致地大量搜集资料，长期地苦苦思索，深入地研究，需要敢于超越或否定前人和同时代人包括某些权威的“定论”。自然科学家不时有因受宗教迫害或由于实验中发生意外事故（如发生爆炸，致物质扩散等）而付出生命者；人文社会科学家因坚持真理或偶有偏颇而家破人亡者更不鲜见。上述现象除意外事故外，在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的当今中国，已可减少到最低限度，但除无意的误解外，仍有心怀他图而有意曲解别人学术论著者在，所幸这种人越来越少。从过往的历史看，学术问题，不仅不是一时所能判定是非，而且也不能少数服从多数。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在

50年代被当作谬论批判，到70年代末中国人口大爆炸并已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阻力和负累时，大家才明白谁对谁错。胡风先生文艺思想的遭遇，也是一个明证。此外，还应看到，对任何学术问题，都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片面到全面，从粗疏到深刻精密的认识过程，因此，凡致力于学术事业或以学术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为重的人，自然会爱护所有认真研究的学术结晶，珍视他人的劳动成果，特别是对多有新意而不尽周密的论著，不作苛求，更不会举起棍棒。

张洁同志的这部书稿，不仅使我受到很多启发，领略了新的思路展现的风光，而且心海中又一次泛起了幸福的涟漪。我相信他不会满足已有的成果，将会在学术上不停顿地奋进。

1994年1月2日

序

冯天瑜

五年前，我给湖北大学文科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化概论”，张洁君是听课者之一。这批研究生多有一定的生活历练和相当的学术根基，而且大都对文化学兴趣盎然，且有触类旁通的发散式思维趋向，常在课余同我作纵横谈，彼此颇获切磋之乐。正是在此间，张洁君的执著、好思给我留下难忘印象。他取得硕士学位后，去华中师大工作，近几年便很少谋面，只是听说他到武汉大学陆耀东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学术上锐意精进，窃为之喜。约两个月前，张洁君送来近著《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文稿。因其时我文债甚急，张著只能在夹缝间断断续续阅看，尽管如此，这部论著以独到的识见、犀利的剖析使我精神为之一振，某些久已顿滞了的思维角落竟被激活。读一部书稿产生这种感受，实在不多得。

《思之思》是一部思辨性著作，其思考对象是20世纪中国的文艺思潮，是对本世纪中国一批锐利的思想者思维路径的反思（这里是在本来意义上运用“反思”一词的）。

20世纪的中国思想舞台，可谓古今中西大交会，新旧杂陈、中外比照，变幻之剧烈，转化之迅疾，都是空前的。把握这样一个转型时代的思潮，而且是最敏感的文艺思潮，确乎不易。《思之思》在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问题，又深得现代诠释学理论与方

法的精义，一方面竭力恢复昔贤在他们所处时代的“当下之思”的原貌，另一方面又从现代人的“当下社会情境、当下文化思想体验”出发，寻找昔贤思考与今人思考之间的对应关系、内在线索及其迁衍变通。因此，《思之思》较成功地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它关于茅盾、瞿秋白、冯雪峰文艺思想的解剖便得到新的视角；关于胡风与朱光潜、周扬与胡风，胡风与冯雪峰的比较研究也每有创获；对曹禺、路翎等作家的评断，特别是对姚雪垠前期作品的社会学解析，尤显新意；至于对当代文学现象的解析，作者更有一种身历其境的贴近感，每能一语中的。

《思之思》长于冷峻的社会解剖和严肃的历史价值判定，然而，细心的读者可以透过其“冷面”发现深切的忧患意识，感受到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古道热肠。这种理智与情感的交织，增添了论著的魅力。当然，由于《思之思》的内容和文字趋向哲理化，未能充分展示文学形象性的优势，读者只有以静定心态，细细体悟，方能感触到这部“冷面热肠”的作品的炽烈内蕴。

1994年1月17日于武昌寓所

自序

—

印在纸上的这些文字，记载着我踏入学术领地后蹒跚学步的足迹，记录了我的思之思。

二

我始终认为，离开当下社会情境、当下文化思想体验，思是没有意义的。当代人如何思，具体地说，处于当下社会情境、当下文化思想体验之中的我如何思，是我为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思而非他思，我思及对象，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

思之对象是20世纪中国的文艺思潮。我最关心的是在中国近百年历史各重要时段上的思想者之思。他们的思当然是他们的当下之思。他们的当下之思能否对应我们或我的当下之思？若能，那么，这种思无疑极有意义，我力求把它发掘出来。若不能，那么，我要进一步问：这种思对于我们或我还有没有认识价值？若有，就仍可作为我思之对象。

四

我思时断时续，也就是说，这些文字不是在一个完整的单元时间内写就的，但自信还是有脉络可寻的。细心的读者当不难看出，我对姚雪垠农民题材类作品的论析，完全可以被视为“概论编”首篇文字一个论点的实证，也可以被视为我对中国特殊的现代化道路之思。中国资产阶级生不逢辰的悲剧命运，在很大程度上

上是由农民决定的。农民与土地分离，原因较多，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远东的扩张。没有这种扩张，中国的工商金融业就不会迅速扩大，农村就不致于大面积衰败，大量农民就不会流离失所。农民本能仇视资本主义的激烈情绪，沿袭了几千年的农民意识，不可能自行上升为指导他们自觉行动的理论，因而他们反抗资本主义的行动，犹如茅盾《春蚕》中的老通宝，多是盲目自发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正在于把农民的这种情绪和农民意识上升为反帝反封建的理论，使农民一个阶级的利益和理想转化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理想，从而成功地引导农民为民族和国家而战。在《牛全德与红萝卜》中，在姚雪垠最重要的作品《长夜》中，土匪和土匪类战士渴求一小块土地而不得，最终踏入革命行列和转变为革命战士的过程，既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概括，也是作家浸透农民意识的理念再现。有着这种理念的作家，远不止姚雪垠一人。中国知识分子天生就有农民的根性。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凉，往大里说，岂不正是农民式悲凉！由资产阶级播撒的种子，在中国大陆发得了芽，开得了花，却结不出硕果，这难道与“悲凉之雾”无关？绝对不可能。所以我说，一方面“历史与伦理在这里呈现为鲜明的二律背反状态”，另一方面又“呈现为鲜明的和谐一致状态”。

此外，我对现代“自由作家”历史命运，“五四”文学精神转换，当今中国文化（含文艺）的青春化、相对化，当今中国作家角色嬗变等论题的思索，也关联到我对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取向的整体思考……在整一的历史“长时段”中考索个别重大思想文化现象，所瞩目者大，论述恐怕就会深入透彻一些。

五

现代中国少有范畴概念清晰严谨、逻辑推理严密充分、体系完备规范、秩序井然有序的文艺理论。联系朱光潜和胡风不同的

学术气质，我专门比较了二者文艺理论不同的形态。朱光潜的文艺理论是“学院型”的，而胡风的文艺理论则是“实用型”的。朱光潜的文艺理论形态在现代中国相对稀有，而胡风那样的文艺理论形态在现代中国则较为常见。那么，怎样准确把握常见形态的文艺理论就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我的解题办法是抓住他们的思维方式，抓住他们理论的核心范畴或概念，提纲挈领，打通他们考察问题的思路或理路，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理论的核心范畴或概念当作车轴，把他们对于各种不同问题的论述当作车辐，连接车轴和车辐。我研究茅盾、瞿秋白、胡风、冯雪峰和周扬的文艺思想，用的就是这个办法。我研究“五四”文学精神转换之缘，曹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范式，用的也是这个办法。

我发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是生活，然而生活并不是一个无可置疑的自明概念，其中心意涵是政治。政治，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那里，主要指观念形态的政治即政治观。因此，要求文艺反映生活，实质上是要求文艺反映自身所属政体或政治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尽管胡风与周扬的文艺思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在这一点上却不存在多大分歧。30年代的茅盾、瞿秋白和周扬，不管意识到没有，都执持此一观点。在他们的文艺理论批评实践中，阶级成为衡人论文、判别是非的核心概念，不会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观又等于阶级观。沿着阶级观线索，我找到了“五四”以后文化批判者的思维方式，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内在理路，冯雪峰的文化交流律与其文论的关系，周扬和杨晦等人的文艺批评范式……进而我还找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某些本土特色。这就为我在世界历史文化背景中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东渐，和中国文艺思想大的走势打下了基础。

六

又到了世纪末。世纪末的中国，意味深长。象我这样的 50 年代出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 1978 年后巨变的人，感受不可能不深切复杂。我是把我真切的人生体悟带进我的研究工作中去了的。我对当前文化（含文艺）的所有想法都是从这种体悟中产生的。我的着眼点是人，位于一定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人的活动可以改变但不能超脱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为人定位，人的社会角色依社会结构异动而变换。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方式，不可能摆脱社会结构制约。为什么当今中国文化出现青春化、相对化趋向？为什么王朔们无所顾忌地把创造变成生产，去除了文学写作的神圣性？为什么先锋小说产生在 1985 年前后？作个设想吧：这些事实都发生在 1978 年以前。可能吗？一点儿可能性也没有。社会结构的异动，人的社会角色的随机变换，才是引发上述变化的前提。

还有必要说说命名问题。本书有专谈命名问题的文字。命名——不止是为通俗文学重新命名——在此时是非常困难甚至办不到的一件事。所以我只是“寻找重新命名的途径”，给出了我对于当前雅俗文学合流的一点认识，而没有给出确定的名称。我知道，在整个社会急剧变动中硬性给出确定的名称，肯定不明智，且吃力不讨好。也许你刚刚给出一个确定的名称，这个名称立时就不管用了。命名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名与实，一到社会转型期就两相离析，想扣合也扣合不了。名词大换班，实是势所必然。不过，无所作为也不好，把名实乖离的社会文化因素和性状揭示出来，你能说没有意思？我试图这样做，但做得不够，远不尽人意。

七

不想谈我使用了哪些研究方法。比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对象，对象规定和限制着研究方法。我特别重视进入对象的思维角度。站在哪个方位，怎样看，看得清不清楚、深不深入，才是我最留心的问题。有了好的思维角度，必有好的研究方法。选定了思维角度，也就选定了理论和方法。我选定的思维角度好不好，是否有助于我准确进入对象，我还不完全吃得准，还有待专家审定。

八

书名为《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有点名不符实，有缺环，至少未论20世纪初中国的文艺思潮，就是已论及的某些内容如1978年以后中国文艺思想的变动情况，也不大全面详实。好在我正在做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正好涉及20世纪初中国的文艺思潮，而1978年以后中国文艺思想的变动情况，也已列入我下一步工作计划。弥补还来得及。

九

我蹒跚着前行，留下了一串歪歪斜斜的足迹。越走越感到前路迢迢。我能走多远？踏上学术之路是幸事还是悲剧？既然还得走下去，那么继续提问的方式就是：我能不能走得正一点、远一点？我是否在传承先哲时贤知识的同时，说出了一点自己的话？如果没有，那么今后能否说出？

1993年11月12日

于武昌东湖之滨

目 录

序	陆耀东(1)
序	冯天瑜(6)
自序	(8)

· 概 论 编 ·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取向	(3)
历史取向——文化取向——一个结论	
历史的回旋——从周扬《我们需要新的美学》说开去	(19)
呼唤新的美学——历史的回旋——历史成因——理论检讨	
中国新文学中的“平民意识”论纲	(46)
试谈文艺的商品性	(59)
文艺的商品性为何被放逐——意识形态包容商品性——文艺的商品化——余论	
√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76)

· 现 代 编 ·

茅盾文艺观的发展及其作家作品评论	(85)
文艺观的发展——作家作品评论	
瞿秋白文艺思想的演变及其理路	(97)
矛盾——定型——理路证明之一——理路证明之二——余论	
冯雪峰文艺思想的政治意蕴	(110)
全能视角——政治视角——政治意蕴——基本评估	